

求智枕边书



○ 研究学问与人生修养
关于治学和做文章
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



○ 一生在寂寞中行走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你要活得洒脱些
谈独立思考



○ 人生在创造
交友待客之道
我的处世哲学
不要抛弃学问
人与人之间
为智慧所累

求识智慧

邓九平〇主编

求识智慧

邓九平◎主编





梦求智慧枕边书

求识的智慧

目 录

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	蒋梦麟(2)
怀念我的老师	苏步青(5)
敬悼俞平的先生	钟敬文(9)
爱的教育	费孝通(17)
我的老师董秋芳先生	季羡林(20)
高小老师夏育轩	任继愈(24)
悼朱光潜先生	李泽厚(27)
纪念我的老师王玉田	史铁生(30)
研究学问与人生修养	李大钊(36)
不要抛弃学问	胡适(39)
治事如治学	林砺儒(41)
怀疑与学问	顾颉刚(45)
漫谈自学	夏承焘(47)
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	俞平伯(50)
治学漫谈	苏步青(55)
我的治学态度	金景芳(60)
学问与趣味	梁实秋(62)
治学的门径	张岱年(65)
“上大学”	启功(71)

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	杨振宁(78)
世故三昧	鲁 迅(88)
谈独立思考	茅 盾(91)
沉 默	朱自清(93)
寂 寞	陆 蠲(97)
遗 憾	金克木(101)
谈寂寞	徐中玉(104)
人生在创造	王得后(109)
何妨孤独	陈世旭(113)
说奉承	贾平凹(118)
关于崇高	王小波(122)
沉 默	赵丽宏(125)
渴望苦难(节录)	马丽华(127)
一生在寂寞中行走	王开林(129)
谈交友	朱光潜(134)
谈助人	钱歌川(141)
谈友谊	梁实秋(145)
谈交友	钱钟书(149)
交友待客之道	邓 拓(158)
论友谊	严文井(161)
说朋友	思 果(165)
谈友谊	周 涛(170)
请 客	王 力(175)
说请客	贾平凹(178)



梦求智慧枕边书

求识的智慧

- 相见以诚 郭沫若(182)
宽 容 顾颉刚(185)
善与恶 钱 穆(192)
说 “忍” 陈子展(196)
论诚意 朱自清(200)
人与人之间 钱歌川(204)
节 操 曹聚仁(207)
独 笑 施蛰存(209)
三笑记 金克木(212)
随遇而安 汪曾祺(216)
谈舒服 思 果(226)
善 良 王 蒙(230)
旷达篇 杨闻宇(233)
安分守己 戴厚英(236)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鲁 迅(240)
论气节 朱自清(242)
绝顶聪明和额外愚蠢 陈子展(247)
谈休息 朱光潜(249)
谈痛苦 哈克家(254)
谈 天 钱歌川(257)
学说话 金克木(260)
芸斋琐谈 孙 犀(264)
苦 味 张岂之(273)
你要活得洒脱些 韶 华(276)

③

危机人生太极

我的处事哲学	王蒙	(279)
且看小人	杨闻宇	(288)
说花钱	贾平凹	(291)
珍惜愤怒	毕淑敏	(295)
为智慧所累	艾云	(298)
广博·勤奋·赶超	谈家桢	(302)
和青年朋友谈学习	钱伟长	(306)
学与识	华罗庚	(310)
白首学徒的话	柯灵	(319)
信仰	严文井	(320)
说谦虚	吴晗	(323)
与自学青年朋友共勉	吴小如	(326)
功到自然成——写给在校的同学们	杨乐	(330)

薪火的相传



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

蒋梦麟

光绪己亥年的秋天，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佳宾会集，杯盘交错，似乎兰亭修禊和桃园结义在那盛会里杂演着！

忽地里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多岁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

“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

大家哄堂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这位才子，是二十岁前后中了举人，接连成了进士，翰林院编修，近世的越中徐文长。酒量如海，才气磅礴。论到读书，一目十行。讲起作文，斗酒百篇。

一位年龄较长的同学对我们这样说。

这是我们学校里的新监督，山阴才子蔡鹤卿先生。子民是中年改称的号。

先生作文，非常怪癖，乡试里的文章，有这样触目的一句：“夫饮食男女，人生之大欲存焉。”他就在这篇文章中了举人。有一位浙中科举出身的老前辈，曾经把这篇文章的一大段背给我听过，可惜我只记得这一句了。

记得我第一次受先生的课，是反切学。帮、旁、茫、当、汤、堂、囊之类。先生说，你们读书先要识字。这是查字典应该知道的反切。

危机人生太极 之求识篇



二三十年后先生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聚了几百人，要求免费，其势汹汹。先生坚持校纪，不肯通融。秩序大乱。先生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道：“我给你们决斗！”包围先生的学生们纷纷后退。

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

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

“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这是先生五四运动时出京后所登之广告。

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先生平时与梁任公先生甚少往还。任公逝世后，先生在政治会议席上，邀我共同提案，请政府明令褒扬。此案经胡展堂先生之反对而自动撤销。

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在不知不觉间受老子的影响的。先生亦不能例外。故先生处事，时持“水到渠成”的态度。不与人争功，不与事争时，别人性急了，先生常说“慢慢来”。

一位在科举时代极负盛名的才子，中年而成为儒家风度的学者。经德、法两国之留学而极力提倡美育与科学。在教育部时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在北京大学时主张一切



学问当以科学为基础。

在中国过渡时代，以一身而兼东西两文化之长。立己立人，一本于此，到老其志不衰，至死其操不变。敬为挽曰：“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原载 1940 年 3 月 24 日重庆《中央日报》。选自《蔡元培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第 1 版）



怀念我的老师

苏步青

当我翻阅精装的《苏步青数学论文选集》，心头总是那么激动。除了专著之外，这些论文就是我几十年日夜奋斗留下的文字硕果。在欣喜之余，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几位启蒙和引路的老师。没有他们的教导，我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呢？

我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北港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就参加割草、喂猪、放牛等辅助劳动。十岁那年，我父亲借了几块钱，送我到离家一百多里的平阳县惟一的一所小学当了插班生。

平阳县的语言很复杂，北港山区讲的是闽南话，而县城讲的却是温州方言。当时我连学话都来不及，书当然念不好，小孩子又好玩，第一学期结束，我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一名。

第二年，我的家乡北港开办了一所小学，我便到那里继续念书。虽然这里不像县城语言复杂难懂，但是上学的大多数是富家子弟，我常受到欺侮和歧视。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其中有两句比较好的语句，有个教师竟怀疑不是我写的，在作文本上批了个“差”字。对此，我十分反感，以不听课的方式，对抗这位老师的蛮横无理。结果，这学年我又一次得到倒数第一名，差点不及格。

新学年开始了。新来的陈玉峰老师是一位正直可亲的读书人，他从不歧视穷人家的孩子。不久，陈老师发现

危机人生太极



我比较沉默寡言，就主动接近我，对我说：“你是聪明的学生，你家穷，父亲宁愿让全家吃杂粮，却把大米省下来，送你上学念书；而你读书却无精打采，这对得起你父亲吗？”

我听了马上说：读书，读书，有什么用？文章做得好，还说不是我做的。查清楚了，还给我批‘差’字，这不是存心在刁难我吗？

“不！文章好坏，不是哪位老师可以决定的。”陈老师对我的想法进行开导：“个人的前途，要靠自己去争取，我看你的资质不差，只要好好努力，一定会成为有用之材……”陈老师的话，讲到我的心坎上。我想，是啊，呕气有什么用，这对得起老师，对得起父母吗？从这以后，我开始集中心思学习。这学年结束时，我竟获得全班第一名。以后每次考试，我都名列前茅。至今想起这件事，我仍非常感激陈玉峰老师，是他耐心的教导，使我走上为学的长途。

1915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设立在温州的浙江省第十中学。就在上二年级时，学校聘请了一位姓杨的老师。他教我们数学。数学一向比较枯燥乏味，但杨老师的数学课却非常吸引人。他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带回不少科学杂志，常常教我们阅读这里的数学知识和习题。特别是那些很有意思的习题，把我吸引住了。我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把过去读文史书籍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钻研数学了。幸而我以前曾刻苦学习语文，对语文有坚实基础，所以这时可充分腾出时间来钻研数学。

有一天，杨老师找我谈话：“你的作文写得好，文史知识也很丰富。可是，我们的国家现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谈那些古老的历史、文学就能救国吗？”杨老师直截了当地宣传“科学救国”的道理。在上课的时候，杨老师谈到我们

中华民族受到列强凌辱的历史，就激起我学好数学的强烈欲望。我终于向杨老师表示：“我想多学点数学，请多加指教。”老师满腔热情地接受我的要求，只要我去找他，他总是尽力地给我以帮助。我不管酷暑严冬，还是霜晨晓月，都抓紧时间读书、思考、解题、演算，在数学上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为了证明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一定理，我采用大同小异的二十种方法，并写成一份论文，被送到当时浙江省的一个学生作业展览会展出。

由于我在这方面学习崭露头角，引起了中学洪颜远校长的关注。当时洪校长兼教平面几何，看到我勤奋学习，常在自修时看我的作业本，每看一道题，就露出一丝笑容，有时频频点头。

有一天，洪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又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便告诉我说：

“我要调离学校，到教育部去工作。你毕业后可到日本学习，我一定帮助你。”

那年中学毕业，我想起洪校长的嘱咐，便写信告诉洪校长。不久，我就收到二百块银元。我捧着白花花的银元，激动地流下热泪。洪校长不仅在数学方面引导我走上成才之路，而且从经济上给了我及时的资助。我非常感激，因为这是我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1917年秋天，我乘上日本海轮，从上海驶往日本。洪校长又寄来临别赠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为中华富强而奋发读书。”短短的几句话，我却铭刻在心，并且一直鼓励我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尽力。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又接触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著名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教授，他是我数学论文的指导老师。



洼田教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每周检查一次，要我汇报学习情况、存在问题和对问题的想法。这种指导方法，对我独立思考、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有一次，我有一道解析几何难题解不出来，去向洼田先生求教。教授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说：

“你去查查沙尔门·菲德尔的《解析几何》吧。”这本书有厚厚的三大本，近两千页。回来一看，暗想：这书何年何月才能读懂念完呢？我一面埋怨老师不具体指导，一面不得不硬着头皮啃。等啃完这套书，我对洼田教授充满了无比感激之情。因为这套书不但解决了我的具体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我掌握了终生有用的基础知识。

时间过去六七十年了，但老师的教导，我仍念念不忘。在旧中国，我受到“科学救国”的影响，也很想为国家尽力，但那是不可能的，政府腐败无能，有科学也难救国。今天，党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向现代科学进军，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加促社会主义建设，已是十分紧迫的事了。老师教给我的知识和技能，就应该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我们要热爱老师，尊敬老师。当了老师，就要自重自爱，更加关心年青一代学生，使他们尽快成为栋梁之才，这也是新一代教师的历史使命。

所有为我的成长、进步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我都永远怀念他们！

1986年10月



敬悼俞平伯先生

钟敬文

千年诗垒焕新容
青兕初来气吐虹
春草落花人代速
岗头矗立见苍松

——祝贺俞平伯先生学术活动 65 周年二绝
之一(1986 年 1 月)

10 月 23 日上午,我从昌平开完“吉林故事卷”终审会回到学校寓所。少息之后,随手翻阅书几上本月 20 日出版的《文艺报》,在第一版上看到俞先生逝世的消息。再检看 17 号的《光明日报》(在昌平六亭饭店的几天里,因为工作忙,没有找报看),也有同样的报道,用的是新华社的稿子,姓名前并冠以“著名文学家”的称号。这个突如其来 的消息,一时使我不禁愕然。

不错,俞先生已经享受了人生的高年,并且从青年时代起,就为了祖国的新生和光荣,在文艺和学术的领域里竭尽聪明才智、取得了光辉的成绩。他今天的逝世,从他个人看,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遗憾了。但这到底是理智上的说法。从我们的感情上说,却总觉得他还应该活得长久

危机人生太极



些。他的突然离去，总不免给我们留下惋惜和绵绵哀思。

我和俞先生的交往，并不算早（虽然也已经 40 多年了）。但是长时间通过学艺上的接触——心灵的接触，对我来说，我们的关系却是并不浅显的。这得回溯到“五四”时期，俞先生年龄上虽然只大我 3 岁，但他在文化的接触和滋养上，却比我大大占了优势。他出身书香门第，很早就进了北京大学。而这所大学恰好是新文化运动的大熔炉。他在时代风云的感召下，从此毅然投入新文化阵营。他抛开旧诗、改作新诗——他成为当时北大学生中间创作新诗成绩比较突出的两诗人之一（另一位是康白情）。除新诗之外，他也写作社会、诗歌评论及抒情散文。他是早期新思想、新文学团体新潮社和文学研究会（稍后还有语丝社）的重要成员。

俞先生在“五四”前后的学艺成绩是很显著的。他连续出版了新诗集《冬夜》（1921）、《西还》（1924）、刊行了文艺论考集《红楼梦辨》（1923）和散文集《剑鞘》（与叶圣陶合作，1924）。此外还有一些别的作品发表（如《雪朝》诗集里的专辑）。但只从上述著作中，我们也可想见他的创作力的健旺和影响力的巨大了。当时 20 岁左右的我——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正是被这种新文化潮流推动着前进的（虽然在稍后的时期里，我逐渐在学艺上摸索出自己的道路）。

我初入学艺界，在文艺创作和学术探索上，都曾受到俞先生的影响。在这里，我试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1928 年冬，我在杭州写了一篇题为《西湖的雪景》的散文（这篇文章，稍后收入我的散文集《西湖漫拾》，并被一些选



本所选载，知道的人是比较少的），内容是讲雪中游西湖（踏雪登韬光寺）的观察和感兴。它与俞先生的名文《陶然亭的雪》粗看去尽管只有题目中的对象（雪）彼此相关，其它并无什么雷同的地方，而我至今也不能明确指出它所受影响的痕迹。但从当时的情形看，它无疑是受过《陶然亭的雪》的启发的（选题方面的启发）。

此外，对文艺的理解，我当时也多少有得益于俞先生的地方。俞先生在 20 年代曾在《诗》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诗底进化的还原论》的论文（1922），是主张诗的群众化的。据他自己说，该文受了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的影响。这自然不错。但是，从这种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看，却与当时学界盛行的“平民主义”密切相关。我当时也是托氏《什么是艺术》中有关见解的信奉者，又是受着“平民主义”熏陶的知识分子，但头脑中这种文艺观念（诗的群众化）尚较为漠然。而俞先生却对它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这就不但唤起了我的共鸣，而且也使我在观念上更加明晰和确定。也就是说，他的论文，使我在文艺思想上沾了光。

在新文化运动后的那段时期里（约 10 年左右），我和许多文学青年一样，在学艺上受到俞先生等先驱者们学绩的滋润，对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当时已意识到，而且是对他们怀着敬慕和感谢之情的。这自然反映到我们的文字上。记得那是 1939 年的冬天吧，我写了一篇《平伯君的散文》，是抒情地写述我对他的散文集《杂拌儿》的感应的。文章一开头就说：“近来常常来往西湖堤上，每到西泠桥附近，望见了遥对着南岸诸山的俞楼，便教我想起曲园老人和他的曾孙平伯君。”在这段文章的后半又说：

危机人生太极